

曾谈及“新文化运动”与五四运动二者既密切联系，又不无区隔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学界喜欢混用这两个概念，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的立场很明确：“若谈论新文化运动，尽可能往上走，从晚清说起；若辨析五四运动、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，则最好往下延伸，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。往前追溯，从晚清说起，主要是史学研究；往后延伸，牵涉整个20世纪，更侧重思想操练。或者说，谈论小五四（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），重在考证与还原；研究大五四（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），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。”我的五四研究三书，第一本直接面对，第二本往前追溯，第三本往后延伸。之所以选择三种不同路径，基于五四话题本身的丰富性、复杂性与现实性。

我常常扪心自问，我们今天有无需要/能力/机缘与日渐隐入历史深处的五四展开深入细致的学术及思想对话？同样潜心学问，不是所有题目都能“将历史照进现实，让学术上升为精神”的。但在我看来，五四这个话题可以做到，也应该做到。我多次提及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院门墙的愿望，曾表达四个担忧，其中最重要的是“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，没能因应时代话题，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”。这也正是我所说的五四作为论题的重要性，即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“磨刀石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。您提出，从晚清到五四，这种对国家失败的不满与怨恨，透过各种大众传媒与文学作品，得到广泛的传播。因新媒体的产生，危机意识得以迅速蔓延，新媒体的出现，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，因而是产生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因素。正是这种传播媒介的转变，决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达方式。某种意义上，像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等人的杂文、小品文、随笔的写作，都是这种传播媒体发生改变后的产物？

陈平原：在太平年代，一切波澜不惊，且似乎都顺理成章，你不会想那么多、那么远的。只有设身处地，与五四那代人同样置身于“危机时刻”，你才能感同身受，理解他们的焦虑、愤懑、激情、胆识，以及仓卒应战所选择的策略。

陈平原

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、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、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2024年出版24卷《陈平原文集》。

这里包含奋斗的方向、思考的深度，还有文体选择。在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第二章“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”中，我专门谈论《新青年》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，在社会与个人、责任与趣味、政治与文学之间，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，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：“通信”和“随感”。关于“随感录”的横空出世，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自由挥洒的专栏/文体，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——政治表述的文学化。这方面的

论述好理解，我较为得意的是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《新青年》的“通信”，认定其“拟书札”的姿态，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，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：“通信”作为一种“思想草稿”，既允许提出不太成熟的见解，也可提前引爆潜在的炸弹。除此之外，“通信”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，将不同栏目、不同文体、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，很好地组织或调配。在某种意义上，《新青年》不是由开篇的“专论”定调子，反而是由末尾的“通信”掌舵。如此琐碎的文章，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，实在是个奇迹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五四时期，旧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，新体制及师资建设仍在路上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，更多地得益于自由阅读，而不是学校的系统训练。这就决定了这一代文化人所吸收的养分，主要来自民间？

陈平原： “民间”是相对于“官方”而言，不同历史时期，朝野之间力量对比有很大差异。五四时期，政府的控制力度不强，各种思想学说风起云涌，形成了“众声喧哗”的局面。应该讨论的是，同样属于梁启超所说的“传播文明三利器”，学校与报章之间，在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方面有何不同。我谈青年学生“自由阅读”的趣味及习惯，既缘于学校规章制度的相对松懈，也来自各种新媒体在传播新知方面的竞争优势。我们都晓得，一般而言，学校传授的知识比较系统，但相对滞后；媒体对于新知的介绍及时，论述自由，但松散或肤浅。身处狂飙突进年代，知识日新月异，青年学生的阅读趣味很容易偏向于媒体。而在五四时期，媒体不受政府控制，所以，说那一代文化人吸收的知识及精神养分“主要来自民间”，也可以成立。

陈平原先生刚刚推出了《未完的五四：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》一书。

